清代理学

李绂与陆王心学

李 帆

［摘要］在清代中叶的学者中，李绂是维护陆、王最力者，他以各种方式表明对陆王心学的尊崇，对发扬陆、王学术做出了较大贡献。一方面，他反对寻章摘句为学，推崇陆、王躬行实践之学；另一方面，他力图建立陆、王学统，以与程、朱相抗衡、争正统。此外，对于陆王心学中的一些学术问题，他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所以，他被誉为当时的“陆、王学者第一重镇”。

［关键词］李绂 陆王心学 躬行实践 陆、王学统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6）－04－0044－07

Li Fu and "School of Mind" (xinxue) of Lu Xiangshan and Wang Yangming

Li Fu was the greatest defender of "School of Mind" (xinxue) of Lu Xiangshan and Wang Yangming in the mid－Qing Dynasty. Li respected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philosophy in a variety of ways. On the one hand, he opposed the lack of originality in clichéd academic study and canonized the learning of Lu Xiangshan and Wang Yangming. On the other hand, he tried hard to establish the academic legitimacy of Lu Xiangshan and Wang Yangming and disputed the orthodoxy of Cheng－Zhu Confucianism. In addition, he also expressed some original opinions regarding the "School of Mind" of Lu Xiangshan and Wang Yangming. Thus, he was praised as "the first important scholar of Lu－Wang School"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在清代中叶的学者中，李绂是维护陆、王最力者，他以各种方式表明对陆王心学的尊崇，对发扬陆、王学术做出了较大贡献，以致于被誉为当时的“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所以，研讨清代理学史，不能不将李绂的学术建树作为重要课题。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学术界对此仍关注不够，学理性的研究颇为缺乏①。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一主题的一些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一

李绂（1673～1750），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今抚州）人。少时颇具天赋，有神童之称。10 岁能为诗，12 岁即与里中诸先生结为诗社，文思敏捷，作品颇丰。青年时代困于场屋，24 岁为秀才，但 35 岁前四次乡试皆不售。其间专意词章，游学授徒。康熙四十七年（1708），第五次乡试中举后，得江西巡抚郎廷极资助去京，第二年得中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后历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广西巡抚。雍正三年（1725），升任直隶总督。后以参劾雍正帝宠臣河南巡抚田文镜得罪，在异己势力群加攻讦之下遭革职，被派往八旗志书馆效力。乾隆即位后，复被起用，初授户部侍郎、八旗志书馆副总裁，又兼兵部侍

［收稿日期］2006－4－30

［作者简介］李帆（1961—），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郎。后又授詹事府詹事、三礼馆副总裁、光禄寺卿等。乾隆七年（1742）因病原品休致。著有《穆堂初稿》、《穆堂别稿》、《春秋一是》、《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阳明学录》等。

李绂一生，为官清正，廉洁自守，刚正不阿，对于当朝权贵年羹尧、隆科多、鄂尔泰等从不趋附，而且好学善辩，耿直敢言，为官场所罕见。所以他多为人所惧，亦多所得罪，在官场遭人嫉恨，几度沉浮，并不得意。全祖望曾写道：

> 公以博闻强识之学，朝章国故，如肉贯串，抵掌而谈，如决溃堤而东注，不学之徒，已望风不敢前席，而公扬休山立，左顾右盼，千人皆废，未尝肯少接以温言。故不特同事者恶之，即班行中亦多畏之。②

这样的描绘，已使其气象跃然纸上，其为人处事可想而知。

李绂官场不顺，但为文、为学却多姿多彩，颇受瞩目。综其一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康熙四十八年（1709）中进士以前致力于词章；此后一直到雍正五年（1727）被罢官免职，近20年的时间里，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政治上；雍正五年后的岁月里，主要从事学术研究③。也就是说，李绂的学术建树，特别是其独树一帜的理学成就，基本是在晚年取得的。

李绂的学术生涯，根据其论著所记年月，大致是在入翰林院以后。从其著作可知，他涉猎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经、史、地理、政事、杂考等。不过其学术地位的建立，究其根本是在于《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这些推尊陆、王的著作。正是由于这些著作，方使他成了清代理学史上主心学的代表之一，受到学界的推重。

二

李绂之服膺陆王心学，立场十分鲜明。一方面，他反对寻章摘句为学，推崇陆、王躬行实践之学；另一方面，他力图建立陆、王学统，以与程、朱相抗衡、争正统。此外，对于陆王心学中的一些学术问题，他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李绂阐发陆、王，有其自身特色，是从陆、王之学的某一侧面出发予以论列，而非全盘继承陆、王。他曾不止一次有过这方面的表述，说：

> 陆子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真得圣贤为学之法者。④

> 自象山陆子之教不明，士堕于章句训诂者三百余年。洎王阳明先生倡明绝学，然后士知有躬行实践之功。⑤

由此可见，李绂之论学，注重实务，以“躬行实践”为先，他之推崇陆、王者，主因在是。所以如此，是基于他对仅从书本出发、寻章摘句为学的反感。他还认为此风源自朱熹，故对朱子之学颇为不满，说：

> 古未有以学为知之事者，至朱子始以学、问、思、辨俱属知，因以穷致事物之理为格物。又以《大学》未详言格致之事也，因疑其义亡而为传以补之，于是古人为学之法乃一变。寻章摘句之弊，流为玩物丧志。龂龂于口耳之间，举古人躬行实践之学，不得而见之矣。⑥

> 朱子门人，平日专以读书讲论为工夫，故须无事而后下手。不知圣贤之学，不如是也。⑦

> 朱子中年，亦以读书教弟子，至于晚年，则专以求放心、敦践履为主，而深以徒倚书册为戒……惟《语类》有劝人读书之说，则皆门人以意为记录者耳……善学朱子者，毋惑于门人讹误之词，而细观其晚年所著述，庶不为世俗烂时文、破讲章所误也。⑧

李绂心目中的陆、王之学为倡导躬行实践之学，能够扭转朱学过于重“知”的倾向。他说：

> 圣人之道，固有行之而不著者，未有不行而能知者也。不行而知，是明道程子所谓望塔说相轮者也。⑨

> 天下无道外之事，即无事外之学。早间有事，即从早间事上做工夫；午间有事，即从午间事上做工夫。未有离事而有工夫者……圣贤为学之法者，盖皆因事而后有工夫也。论存养，则事至而此心不

动，大程子所谓动亦定也。论省察，则事至而后有意念，《中庸》所谓慎其独也。至力行之必因事而后见，又无论矣。世岂有无事之工夫哉?[10]

这里的关键，在于“行”和“事”，此为李绂所理解的陆、王之学的本质所在。不过，凡夫俗子不知王学真意，只是盲目从之，这也深为李绂所忧虑。他说：

自阳明先生倡道东南，天下之士靡然从之，名臣修士不可数计。其道听途说起而议之者，率皆诵习烂时文、旧讲章，以求富贵利达之鄙夫耳。间有一二修谨之士，阉然媚世，而自托于道学者，稍相辨论，不知其未尝躬行，自无心得，不足以与于斯事而考见其是非之所在也。[11]

即王学要靠躬行实践方能把握，不躬行实践者，“自无心得”，是没有资格讨论王学之是非的。陆、王之学既为“心学”，自是极重“心得”，李绂对此也非常强调。但他所注重的主要是“心得”与躬行实践的关系，而非王学“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等玄谈。他说：

圣人之学在于躬行心得，由小学以至大学，齐治均平之业咸出乎其中，此学之名与实也。[12]

学必躬行而后心得，得于心而后推之家国天下，无所施而不当。而扬子所谓入乎耳出乎口者，不足与于斯。[13]

在这里，李绂首先认可“圣人之学在于躬行心得”，而“躬行”与“心得”的关系则是“躬行而后心得”，以此“心得”推及家国天下，就能“无所施而不当”。这样的认识，实际是发展了王阳明的知行说。王阳明曾说过：“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4]但关于“知”的来源，却没有明确指出。李绂“躬行而后心得”的提法，说明思想意识是行动与环境的产物，它既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丰富，也是对程朱理学“知在行先”命题的驳斥。至于理学家所热衷谈论的心性，则被李绂斥之为“高言”而深戒。他说：

义理与气质为定名，心与性为虚位……学者苟有志于圣贤之学，躬行实践可矣，何必言心性？孔子之自勉者在子臣弟友，若命与仁则罕言之。子贡亦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孟子因告子论性而误，故反覆与辨耳。其教门人则止曰孝弟而已，义利而已，未尝言性。今之教人者不敢望孔、孟，从学者不敢望子贡，实行不修，而高言心性，妄也甚矣！吾非敢言心性也，吾嫉夫世之实行不修，于阳明子无能为役，而高言心性者也。[15]

这样的言论，仍是本着躬行实践原则发出的，即空谈心性于世无补，也不合古圣贤之道，只有在“实行”方面多修习，才算得阳明心学真谛。

上述李绂的种种议论表明，他之服膺陆王心学，并非是全盘承受，而是有选择、有扬弃的，选择者主要为陆、王躬行实践之学，扬弃者主要为心性之学（不论它属于程、朱还是陆、王）。他如此做，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学术渊源的。明末清初，王学对思想、学术界影响甚大，黄宗羲的思想主张自是这方面的典型，孙奇逢、李颙、彭士望等大儒也无不重视阳明或倾向于王学，他们肯定阳明的“事功”，认为这是阳明学术的必然结果。在实际行动上，他们也效仿阳明，孙奇逢少倜傥好奇节，欲以经世致用；李颙早年侧重经济之学；彭士望曾入史可法幕，参加过抗清活动。他们都是倡导实学却因时势而未竟其志者，所以都强调王学实践之功。孙奇逢说：

阳明良知之说，著力在致字。[16]

知行合一之说，高明重行字，此尤对学者口耳涉猎之病。[17]

李颙说：

阳明出而横发直指，一洗相沿之陋。士始知鞭辟着里，日用之间，炯然涣然，如静中雷霆，冥外朗日，无不爽然自以为得。[18]

这里，他们所谓“致”，所谓“行”，所谓“日用”，讲的都是躬行实践，所推崇阳明者主要在是。对此学术传统，李绂是非常清楚的，他也曾有意识地加以总结，说：

国朝隆兴，士多实学。若孙钟元（即孙奇逢）、彭躬庵（即彭士望）、李二曲（即李颙）、黄梨洲（即黄宗羲）、汤

潜庵（即汤斌）诸先生，皆能窥寻此旨。[19]

所以，李绂所宗尚者，实有前人学术轨迹可循，他也是自觉地承传了这些东西，并将其发扬光大。当然，这种承传只是学理层面上的，而非明末清初学者以抗清为主的实践内容。

李绂提倡躬行实践，批评朱子以读书讲论为学，但自身并非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者流，而是博闻多识，言必有据，颇似乾嘉考据学者之所为。他曾自言读书之勤，说“六七年来细阅周、程、朱、陆、阳明六子之书，各不下十数过。”[20]经过细心研读、分析和比较，他就陆王心学中的一些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对视陆学为“顿悟”之禅学的传统看法，他提出不同意见，说：

> 朱子因陆子教人有发明本心之说，遂以顿悟目之，而其实非也。《陆子全集》二十八卷……尝翻阅数十过，绝无“顿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举木升川至，专以循序为主……即鹅湖之诗，必曰：“涓流积至沧溟海，卷石崇成泰华岑”，此天下所共见共闻者，其不为顿悟之说也明矣。至于发明本心，并非顿悟。[21]

此段论述虽有扬陆抑朱的用意，但出于翔实具体的学术论证，可信度高，故能发挥推翻既有成见的效用。再如王阳明《传习录》中有“照心”二字，有人疑为禅语，李绂则不轻信，反复核查后说“佛书余尝遍阅，并无此二字”[22]，否定了既有之见。勤于读书，读书得间，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这是李绂治学最为可贵之处，也是他不同于一般宗陆、王学者的特色所在。

三

出于与程朱理学相抗衡、争正统的用意，李绂还很热衷建立一个陆、王学统。为此，他专门编有《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阳明学录》（已佚）等书。李绂如此做，是有其学术上的渊源的。明末清初，伴随着清王朝对全国统治权的逐步取得，王学渐趋崩解，学术界出现一股“由王返朱”的声浪。学者们对陆王心学持否定的态度，认为“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罪魁祸首就是王学。顾炎武首先对王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后，王学成为众矢之的，抨击王学，推尊朱子，成为一种风气。此风由张履祥、吕留良诸人开其端，经陆陇其辈而渐入庙堂，至熊赐履、李光地庙堂之上推波助澜，康熙帝对朱学的极力崇奖，朱学彻底压倒王学而占据主导地位。不过，王学虽为强弩之末，但并未成为绝学，一些王学大儒如孙奇逢、黄宗羲等，在重重压力下仍致力于陆、王学术，他们以学术史编纂的努力，为陆、王学术争正统地位。孙奇逢以30年之功，著成《理学宗传》一书，从儒学道统观出发，为王学争正统，肯定王阳明是朱熹之后的道统传人。黄宗羲则以《明儒学案》一书，表达其对王学的尊崇，书中所收学者及阐发之学术观点，皆以王阳明一系为中心。黄在完成《明儒学案》之后，就着手编写《宋元学案》，但未竟而卒，于是，为陆学争正统的任务便落在了后学身上。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李绂编撰了《陆子学谱》，并以《朱子晚年全论》一书继续王阳明的事业。

李绂曾经述及《陆子学谱》之缘起：

> 绂自早岁，即知向往。牵于俗学，玩物而丧志三十余年矣。再经罢废，困而知反。尽弃宿昔所习，沉潜反复于先生（指陆九渊）之书。自立课程，从事于先生所谓切己自反改过迁善者五年于兹。于先生之教，粗若有见焉。独学无友，不敢自信。今岁万子宇兆奉召还朝，相见之次，叩其近业，心同理同，若同堂而共学也。既而同事书局，时相考证，益著益明。乃敢抄撮先生绪言，并其教思所及，共为一书，名曰《陆子学谱》，盖兼用《近思》、《渊源》二录之体。先生之言与行略备，将以藏诸名山，传之其人。俾有志于希圣者门径可循，归宿有所，不沉溺于利欲，不泛滥于章句，不参错于佛、老，庶几斯道有绝而复新之日矣乎！[23]

此文可见，李绂对陆九渊崇尚有加，曾“沉潜反复”于其书，多所研磨，终得万承苍（字宇兆）等协助，成《陆子学谱》一书。该书兼采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和朱熹《伊

洛渊源录》二书之体例，将谱主之言与行合而为一，最终目的则是希望读书人循此门径，“归宿有所，不沉溺于利欲，不泛滥于章句，不参错于佛、老”，致力于复兴陆子之学。

《陆子学谱》是关于陆九渊学术的总结性著述。全书一开篇即阐明陆九渊的思想、学术体系，计有“辨志”、“求放心”、“讲明”、“践履”、“定宗仰”、“辟异学”、“读书”、“为政”、“友教”等，强调其为学宗旨和取向。其后序列陆九渊家学以及弟子、门人、私淑等，从宋代叙述到明代，上下几百年连绵不断。贯穿全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圣人之学，心学也”，即把圣人之学完全归结为心学。李绂就此言道：

> 圣人之学，心学也。道统肇始于唐、虞，其授受之际，谆谆于人心道心。孔子作《大学》，其用功在正心诚意。至孟子言心益详，既曰：仁，人心也；又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先立乎其大，则小者不能夺。仁、义、礼、智，皆就其发见之心言之，而莫切于求放心之说。明道程子谓圣人千言万语，止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至陆子则专以求放心为用功之本，屡见于文集语录。[24]

这样的叙述，无非是表明从唐、虞经孔子、孟子到程子，直至陆九渊，儒学道统一脉相承。陆九渊是孔孟之道的传人，其学系正统儒学，应该兴复并发扬光大。不仅如此，就彰扬陆、王学术而言，《陆子学谱》也起到了孙奇逢、黄宗羲的著作未能起到的作用，即凸显了陆学的体系和特点，使陆王心学的成就与特色在清中叶得以整体展现。同时，该书的编撰是以详尽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加以细密考订而成，这既体现出李绂言必有据的求实态度，也表明汉学考据学风已对李绂产生较大影响。

《朱子晚年全论》是李绂彰扬陆、王学术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在理学发展史上，程朱、陆王之争是核心问题之一，尤其是关于朱、陆异同问题，自南宋以来一直为学者所关注并争执不休。明代中叶，自程篁墩《道一编》始，提出了朱、陆早异晚同之说，接着王阳明根据朱、陆意见相合的 30 多通论学书札，写成《朱子晚年定论》，援朱入陆，进一步证明朱、陆晚同之说。而后学者对此又多有议论，晚明陈建撰《学蔀通辨》、孙承泽撰《考正朱子晚年定论》，对朱、陆早异晚同之说，力加驳斥，认为王阳明是“借朱子之言以攻朱子”。对于朱、陆异同之争议，李绂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眼里，时人之争议，往往出于门户之见，意气用事，束书不观，空谈而已。如他评价孙承泽对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指责时便说：

> 孙北海承泽作《考正朱子晚年定论》，盖从未读陆子、阳明子之书，亦未尝细读朱子之书，徒欲钞窃世俗唾余以附于讲学者也。所载朱子之语，止取其诋諆陆子之言，其论学之合于陆子者，则概不之及。其所辨年岁亦不甚确，如鹅湖之会，谓各赋一诗见志，是全未见陆子语录者也。[25]

即批评孙承泽不读陆、王之书，也不细读朱子之书，完全依据己之所需而下结论，不严谨之至。为了扭转此风，也为了替陆、王争正统，李绂花大力气，多方搜集、整理资料，经细密考订，撰成《朱子晚年全论》，以进一步完善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中的论断。

在《朱子晚年全论》一书中，李绂详尽辑录了朱熹晚年与门人、友人论学的资料，并附上自己的简短评论，以此证明朱、陆晚年之争，乃门人各守师说趋于一偏所致，而朱、陆晚年实际上“所学者符节相合”。他说：

> 朱子与陆子之学，早年异同参半，中年异者少同者多，至晚年则符节之相合也。朱子论陆子之学，陆子论朱子之学，早年疑信参半，中年疑者少信者多，至晚年则冰炭之不相入也。陆子之学，自始至终确守孔子“义利之辨”与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于佛、老，中钻研于章句，晚始求之一心。故早年、中年犹有异同，而晚则符节相合。夫早年、中年所学有异同，因而所论者有疑信，宜矣。至于晚年，所学者符节相合，而所论者冰炭不相入，何耶？盖早年两先生未相见，故学有异同而论有疑信。中年屡相见，故所学渐同而论亦渐合。朱子与项平

甫书，欲兼取两长；陆子与朱子书，谓“康庐之集，加款于鹅湖”，此其证也。考康庐之集，朱子年五十二岁，陆子年四十三岁。自是以往，又十一年而陆子下世。此十一年中，两先生不及再相见。始启争于无极、太极之辨，继附益以门人各守师说，趋一偏而甚之。其兼学于两家者，往来传述，不得先生之意而矫枉过正，如包显道有“读书讲学，充塞仁义”之语，而朱子教张敬夫考索《周礼》[26]，陆子颇不然之。于是朱子指陆子为“顿悟之禅宗”，陆子指朱子为“支离之俗学”，实则两先生之学皆不尔也。《朱子晚年定论》，陆子既不及闻其说，至阳明先生抄为一编，凡三十四条，中间因词语相类而误入中年之论者，特何叔京一人耳。罗整庵摘以相辨，而无知之陈建遂肆狂诋，其实晚年相论皆然，虽百条不能尽也。夫谓朱子晚年讥陆子为禅，虽道听途说，世俗科举之士皆能信之。谓朱子晚年之论尽与陆子合，则虽有意为学，而粗涉其涯涘者，亦不能无疑焉。

今详考《朱子大全集》，凡晚年论学之书，确有年月可据者，得三百五十七条，共为一编。其时事出处，讲解经义与牵率应酬之作，概不采入，而晚年论学之书，则片纸不遗，即诋陆子者亦皆备载，名曰《朱子晚年全论》。曰“晚”，则论之定可知；曰“全”，则无所取舍以迁就他人之意。庶陈建之徒无所置喙，而天下之有志于学者，恍然知两先生之学之同，而识所从事不堕于章句口耳之末，或亦有小补乎！夫天下惑于朱、陆异同之说也久矣。欲天下人学陆子，必且难之；欲天下人学晚年之朱子，宜无不可。学朱子即学陆子，陆子固不必居其名也。[27]

这一大段序文，已将李绂作《朱子晚年全论》之用意和所得之结论表述得十分清楚。一方面，由于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所引朱、陆晚年意见相合的论学书札仅 34 通，中间且有个别失误，以致遭陈建等人“狂诋”，所以李绂要详尽征引朱熹晚年论学之书，以补王阳明所论之不足，并回击陈建等的攻击。他以康熙年间所刻《朱子大全集》为据，详加考析，共得朱熹晚年论学书札、序、跋等 357 条，以材料的丰富精详，令“陈建之徒无所置喙”。另一方面，他得出的结论较之王阳明更系统完善，即“朱子与陆子之学，早年异同参半，中年异者少同者多，至晚年则符节之相合也”，而所谓朱、陆晚年之争，则属误解，实因门人各守其师说、趋于一偏、矫枉过正所致。这样，明中叶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朱、陆异同问题又得一解，而且是考析精良的解释。当然，表面看来，李绂是以文献立言，靠资料说话，不偏不倚，但若细细观察其主观表述的言论，可以说在朱、陆之间还是偏袒陆的，心学家的立场显露无遗。如在概括朱、陆一生之学问时，认为“陆子之学，自始至终确守孔子‘义利之辨’与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于佛、老，中钻研于章句，晚始求之一心。”即陆子始终遵循孔孟之道，而朱子则早年和中年都有游离，至晚年才归于孔、孟，所以两人之学晚年方“符节相合”。如此表述，显然既抬高了陆子又贬低了朱子，甚至会使人产生陆子一直是儒家道统坚定不移的继承者，而朱子至晚才回归道统的印象。再如他“学朱子即学陆子，陆子固不必居其名”的主张也颇具深意。因其深知世人对朱子的尊崇，陆子难与朱子比肩，但说朱、陆晚年相合，学晚年之朱子等于学陆子，这无形中就将陆子抬升到与朱子并列的地位，从而使心学不再被边缘化。不仅如此，书中内容也是以朱就陆，“皆以朱子悔悟为言，又举凡朱子所称切实近理用功者，一概归之心学。”[28]可见，作为心学家，李绂始终不忘为心学争正统的使命，甚至不惜趋于一偏，像他批评朱、陆门人所做的那样。

对于李绂的《朱子晚年全论》，一些学者颇为不满，维护朱学者尤甚。道光时夏炘作《述朱质疑》，曾对此书提出严厉批评，说：

此书不过为《学蔀通辨》报仇，无它意也。朱、陆之学，晚年冰炭之甚，此《通辨》之说，虽百喙亦莫能翻案……所引朱子之书凡三百五十余条，但见书中有一“心”字、有一“涵养”字、有一“静坐收敛”等字，便谓之同于陆氏，不

顾上下之文理，前后之语气，自来说书者所未有也。[29]

在夏炘眼里，《朱子晚年全论》几一无是处，这恐怕也是正统朱学坚定维护者的共同看法。平心而论，朱、陆异同问题是理学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后世学者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迄今仍未有定论，李绂的这一研究也只是朱、陆研究史上的一环而已。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陆王心学居于边缘的不利态势下，它以翔实的史料、精良的考证为陆、王争正统，虽不无门户之见，实亦具一偏之得，学理上并非全然欠通。

总之，作为陆王心学的后劲，李绂为维护陆、王并光大心学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一生学术功业，钱穆曾有评价：

穆堂为人之俊伟，以博闻强记之学为陆、王本心良知作发明，以考史论世为心性义理作裁判，学术、经济、文章冶于一炉，其在当时，虽意有所激，语有所偏，然磊落俊伟，光明简切，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愧矣。[30]

此言虽不无溢美处，但在清中叶程、朱仍占据优势地位以及汉学当道的时代条件下，李绂之所为确也难能可贵，说他是此一时期“陆、王学者第一重镇”，应洵足当之。

---

①关于李绂学术，以往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和杨向奎先生的《清儒学案新编·穆堂学案》（齐鲁书社 1994 年版）作过一些专门探讨，近来则仅有杨朝亮《李绂与〈陆子学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等寥寥几部（篇）论著予以研究，整体上十分薄弱，不少学术问题尚未解决。另外，鉴于李绂与《陆子学谱》的论题已多有探讨，本文在这方面论述稍略。

②全祖望：《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鲒埼亭集》卷十七，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316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③参见杨朝亮：《论李绂的生平与学术》，《东岳论丛》2003 年第 6 期。

④⑦⑩李绂：《书朱子语类后》，《穆堂初稿》卷四五，《穆堂初别稿》，道光辛卯奉国堂刻本。

⑤李绂：《文学刘先生墓志铭》，《穆堂初稿》卷二六。

⑥李绂：《原学》上，《穆堂初稿》卷十八。

⑧李绂：《古训考》，《穆堂别稿》卷九，《穆堂初别稿》。

⑨李绂：《高安县学吴君墓表》，《穆堂初稿》卷二八。

⑪李绂：《致良知说》下，《穆堂初稿》卷十八。

⑫李绂：《来复堂集序》，《穆堂初稿》卷三六。

⑬李绂：《学言稿序》，《穆堂别稿》卷二四。

⑭王阳明：《传习录》上，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4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⑮李绂：《心体无善恶说》，《穆堂初稿》卷十八。

⑯孙奇逢：《语录》，《夏峰先生集》卷一，《孙奇逢集》中册，515 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⑰孙奇逢：《答张仲诚》，《夏峰先生集》卷七，《孙奇逢集》中册，741 页。

⑱李颙：《答张敦庵》，《二曲集》卷十六，《二曲集》，139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⑲李绂：《敕封文林郎恩贡生干先生墓表》，《穆堂初稿》卷二八。

⑳李绂：《答徐编修画堂书》，《穆堂初稿》卷四三。

㉑李绂：《发明本心说》，《穆堂初稿》卷十八。

㉒李绂：《答雷庶常阅传习录问目》，《穆堂初稿》卷四三。

㉓李绂：《陆子学谱序》，《陆子学谱》卷首，《陆子学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5。

㉔李绂：《陆子学谱》卷一《求放心》。

㉕李绂：《书孙承泽〈考正朱子晚年定论〉后》，《穆堂初稿》卷四五。

㉖按此处李绂原文为“刘敬夫”，点校者误以为指张栻，径改作“张敬夫”，不当。

㉗李绂：《朱子晚年全论序》，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1~2 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㉘《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八《子部·儒家类存目四》李绂《朱子晚年全论》条，《四库全书总目》上册，830 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㉙夏炘：《与詹小涧茂才论朱子晚年全论书》，《述朱质疑》卷十，咸丰壬子景紫山房刻本。

㉚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31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